



美学与艺术研究

第5辑

主编 范明华 黄有柱

专稿·中国美学·西方美学
环境与建筑美学·艺术与设计·短论·综述



WUHAN UNIVERSITY PRESS
武汉大学出版社

014041617

B83
192

美学与艺术研究

第5辑

主编 范明华 黄有柱

专稿·中国美学·西方美学
环境与建筑美学·艺术与设计·短论·综述



北航

C1724794



WUHAN UNIVERSITY PRESS

武汉大学出版社

B83
192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美学与艺术研究.第5辑/范明华,黄有柱主编.—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14.1

ISBN 978-7-307-12804-0

I.美… II.①范… ②黄… III.①美学—文集 ②艺术美学—文集 IV.①B83-53 ②J01-5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021652号

责任编辑:胡国民 责任校对:鄢春梅 版式设计:马 佳

出版发行: **武汉大学出版社** (430072 武昌 珞珈山)
(电子邮件: cbs22@whu.edu.cn 网址: www.wdp.com.cn)

印刷:湖北金海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720×1000 1/16 印张:29.75 字数:515千字 插页:2

版次:2014年1月第1版 2014年1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307-12804-0 定价:64.00元

版权所有,不得翻印;凡购我社的图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当地图书销售部门联系调换。

《美学与艺术研究·第5辑》编委会

主编

范明华 黄有柱

编委会成员(按姓氏笔画排序)

王 俊	王祖龙	向东文	朱丽霞	陈望衡
陈庆辉	邹元江	张玉能	张 昕	张贤根
李道国	李跃峰	周益民	杨洪林	武星宽
欧阳巨波	范明华	胡应明	聂云伟	徐勇民
黄有柱	黄念然	彭万荣	彭富春	彭修银
彭松乔	喻仲文	雷礼锡	熊兆飞	戴茂堂

主办单位

湖北省美学学会

武汉大学美学研究所

湖北文理学院美术学院

目 录

专 稿

- 王维、米芾与襄阳 刘纲纪 (3)
- 东汉时期的两都之争：以班固《两都赋》为例 刘成纪 (8)

中国美学

- “泛封建观”批判与中国美学再认识 李跃峰 (23)
- “小国寡民”的美学内涵 王世巍 (44)
- 论庄子的“万物复情”及其美学意义 屈志奋 (50)
- 论《周易》离卦及其美学意蕴 屈行甫 (62)
- 倪瓒绘画的意境分析 李 珊 (71)
- 论董其昌“胸中造化”的心学品格 裴瑞欣 (79)
- 袁枚文章美学思想考论 陈国雄 赵丁言 (90)
- 中国传统美学的历史背景问题 范明华 (102)

西方美学

- 描述美学与美学描述
- 一种元美学视角 聂春华 (119)
- 诗的哲学化与柏拉图“诗学”的内在张力 杨锋刚 (129)
- 理论的反思判断
- 康德的《判断力批判》展现的世界 王晓红 (140)
- 由叔本华悲剧思想看悲剧之“悲” 李红燕 (153)

论本雅明的灵晕与艺术本真	宗紫微 (163)
论(生物)技术崇高	[荷] 约·德·穆尔著 雷礼锡译 (175)
观念艺术:全球艺术的始基,抑或艺术的终结?	[美] 柯蒂斯·卡特 王杰泓译 (186)

环境与建筑美学

浅谈罗尔斯顿荒野美学核心思想	赵红梅 (201)
生态美与自然美的时代价值	曹功良 (209)
中国古代城市制度变迁与城市文化生活的发展	李 纯 (217)
武昌昙华林历史文化街区的建设反思	张 娜 (225)
汉口古镇文化遗产的艺术解读	熊 杰 (239)
对襄阳自然人文景观设计的美学思考	李觉辉 (250)
襄阳“一心四城”美学研究	张泽鸿 (256)
论恩施乡村聚落景观文化遗产的旅游美学价值	张 昕 (274)

艺术与设计

论公共艺术与公共文化服务	黄有柱 (281)
扬·凡·爱克油画的用色研究	周益民 (290)
论中国当代写实主义油画的特点	穆瑞凤 (296)
印度教对印度雕塑艺术的影响研究	刘建华 (306)
气的表现:略论中国钢琴音乐的民族审美特征	李潇潇 (323)
浅论中国电影中的“气”	熊 鹰 (332)
中国民间美术字象似符之探	彭凌玲 耿 阳 (345)
清代云纹图案的设计学诠释	乾 梅 (356)
论服装设计中的形式美法则	黄 蕾 (363)
近30年中国大陆《艺术概论》教材编撰状况研究	喻仲文 郭志斌 (371)
论艺术教育及其向人本身的回归 ——以服装专业教育为例	张贤根 卢 玮 (384)
路易斯·布尔乔亚《大蜘蛛》系列作品的符号学分析	魏 华 (396)

短 论

动、静的审美

——中西传统审美意识的比较 杨 黎 (407)

论消费时代与艺术的大众化

——以电视艺术为例 张亚平 (414)

从汉江流域青铜纹饰到传统绘画“图像”艺术的流变

..... 赵倩倩 李兰兰 (421)

湖北天门蓝印花布开发研究小议 王 妮 (431)

美育价值的再认识 丁长河 (441)

王逸“依经立义”思想研究 张金梅 (448)

综 述

彰显历史文化底蕴 建设生态文明城市

——湖北省美学学会 2012 年会暨“中国历史文化

名城建设的美学反思”学术讨论会综述 李会君 (465)

专 稿

王维、米芾与襄阳

刘纲纪

湖北襄阳自古以来就是一个文化名城，人文古迹众多，许多文化名人的生平活动都与襄阳有关。比较著名的倡导“援诗入画”的王维有“诗佛”之称，米芾则是书法“宋四家”（苏、米、黄、蔡）之一。由于我喜欢书画，所以我想来大略考察一下王维、米芾与襄阳的关系。这对于了解襄阳的文化史以及王维、米芾的艺术成就也许不无帮助。更进一步说，王维、米芾都是曾对中国古代美学的发展产生过重大影响的人物，对他们的深入了解也有助于了解中国美学史。

王维（701—761），字摩诘，山西祁县人。开元九年（721）中进士，事母以孝闻，又博学多才，诗、书、画、乐均工，所以很得唐玄宗和当时任宰相的张九龄的喜爱与信任，仕途与事业上甚为顺利。玄宗为何喜欢王维？我以为这与玄宗是一个爱好艺术的皇帝有关。他实际上就是唐代著名的乐舞——“霓裳羽衣舞”的总导演。开元之后，天宝十四年（755）安禄山发动叛乱，玄宗逃亡四川。此时王维未跟上玄宗逃亡的队伍而陷入贼手。安禄山知王维大名，强迫王维做官，王服药装哑不应。一日，安禄山于凝碧宫开宴，令梨园乐工奏乐，王闻之极感悲伤，作诗说：“万户伤心生野烟，百官何日再朝天。秋枫花落空宫里，凝碧池头奏管弦。”安禄山之乱平定后，有人提出王维应以陷贼为官论罪。后因多人相救得免，仍官至尚书右丞。

实际上，王维从青年时代开始，就与盛唐时代的许多诗人一样，有一种报效国家的豪情壮志，这表现在他早年所写的不少诗中。因此，他是决不会去依附叛贼安禄山做官的。但他却因曾陷贼中一事的影响，而不可能再在政治上有所作为了，于是一心事佛。王维一生信佛，曾经经历了三个阶段：先是信净土宗，吃斋念佛，妻死不再娶，孤身三十年，后信华严宗，晚年又推崇六祖慧能所立的禅宗（南禅）。慧能死后王维曾应其弟子神会之请，作《能禅师碑》

(见《全唐文》)，为弘扬南派禅宗作出了贡献。在唐代，华严宗和禅宗均曾对当时艺术与美学思想的发展产生过重要影响，这都与身为诗人、书画家，又对佛学有深入思考的王维的推崇分不开。

以上是我们据《唐书》的王维本传及其他相关材料对王维的生平作的一个简略的说明。下面再来考察一下，王维因何事、于何时从京师长安到了襄阳，并写下了直接与襄阳有关的《汉江临眺》这首著名的诗。

查《全唐诗》，我们看到在王维的诗作中收入了王维所写的《哭孟浩然》一诗，题下又有王维自注说：“时为殿中侍御史，知南选，至襄阳有作。”所谓“殿中侍御史”，指在皇帝左右，随时听候派遣办理各种政务的官员。“知南选”，据《新唐书·选举志》，指由皇帝派往南方各州郡，了解、协助、指导各州郡确定主要官员的人选，王维即因此事被派往襄阳。孟浩然为襄阳籍著名诗人，年40时（开元十七年）曾至京师太学赋诗，深得王维赏识，两人成为至交。王因“知南选”至襄阳，其时孟已于开元二十八年（740）因病去世，故王作诗悼之，诗中有说：“故人不可见，汉水日东流。借问襄阳老，江山空蔡州。”由此我们可以推知，王维是在孟浩然去世以后，因“知郡南选”于开元二十九年（741）到襄阳的，《汉江临眺》一诗也作于此年。全诗如下：

楚塞三湘接，荆门九派通。

江流天地外，山色有无中。

郡邑浮前浦，波澜动远空。

襄阳好风日，留醉与山翁。

读王维的这首诗，使我们想起宋代苏轼在《东坡题跋》中所说过的话：“味摩诘之诗，诗中有画。”它是诗，同时也是一张很美的画。王维确实最善于以一个高明的画家的眼光去观察各种景色，写出美丽如画的诗。这次到襄阳开湖北省美学会年会，我决心要去找到当年王维临眺汉江的处所，最后找到了，就在临汉城的城门下或者城楼上。但“临汉城”这个名字是何时取的？是王维在此临眺汉江后取的，还是原来就有的？查《旧唐书·地理志》，天宝元年曾将属襄阳州（郡）的邓城县改为临汉县，完全可能与王维曾经在此远眺汉江有关，但目前我们所见到的临汉城已不是一个县的名称了。从临汉城下远眺汉江，我们所看到的景色正与王维《汉江临眺》所写的相似。“楚塞三湘

接，荆门九派通”，从湖北、湖南、江西这样一个大的地理背景写了汉江所在的位置，气势宏大。“江流天地外，山色有无中”，写出了汉江一望无际，山色若有若无，好像水流到了天地之外。“郡邑浮前浦，波澜动远空”，写了属于襄阳郡的村落看上去就好像是浮在水滨之上，其后是波澜涌动的辽远的天空。现在我们从临汉城下看去，汉江中确有一大片好像浮在水上的土地，不过都建起了现代化的高楼大厦。但如果我们使时光倒流至王维临眺汉江时的唐开元二十九年，即公元741年，那时王维所能看到的，当然只能是属于襄阳郡管辖的一些自然村落，也就是他所说的“郡邑”。最后两句诗说：“襄阳好风日，留醉与山翁。”林庚、冯沅君编的《中国历代诗歌选》的注说：“山翁，指晋山简，他曾任征南将军镇守襄阳，有政绩，好饮酒。”这里可能借指襄阳当地的地方官。这个注解不错，但我还想补充一点，这里说的襄阳地方官已不是原来的地方官，而是王维“知南选”的任务完成后新任的地方官。王维选择了襄阳一个风和日暖的天气在汉江边和这些将上任的新的地方官饮酒聚会，既是庆祝他“知南选”的任务完成，同时也是向这些新任的官员祝贺与告别，其时当在开元二十九年的下半年。次年，唐改年号开元为天宝时，王维已回到京师，并参加了改元的庆典。这从他《三月三日曲江侍宴应制》一诗中说“从今亿万岁，天宝纪春秋”，可以清楚看出。

以上谈了王维《汉江临眺》一诗，顺便还可以再大略谈一下他的画。在唐代，对山水画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的有两个人：一个是唐高宗时代出了名的李思训，另一个就是唐玄宗时代出名的王维。李思训喜画高远的群山，画法工细，以大青绿着色，金碧辉煌，明显受到唐代提倡的道教神仙思想的影响，到后世发展为北宗山水画。王维则不同，他好画平远山水，追求一种不假人工雕琢，接近自然的风格，深受唐代佛学华严宗、禅宗（南禅）的影响，被后世誉为南宗文人山水画的创始人。他曾在唐代寺院壁上画有《辋川图》，这是他的代表作，但因寺院倒塌早已不存。后人摹仿者极多，不过多是一种凭空想象的摹仿，不足为信。现存有宋徽宗题名的王维《雪溪图》，所画为平远景色，接近自然。

我以为虽不能论定就是王维所作，但可能比较接近于王维的风格。除山水画外，在历史上有关孟浩然的记载中，曾讲到王维为孟画过像。如属实，那么王维除能画山水外，还能画人物。

上面讲了王维，下面再来讲一下与襄阳有更深关系的米芾。

米芾（1051—1107），字元章。芾，音 fú，与黻通，意指古代礼服上表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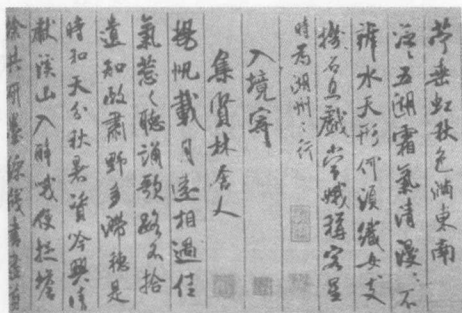


(王维《雪溪图》)

德的纹饰。从襄阳米氏宗祠刻石所载米氏家谱，我们可以确证米芾祖籍山西太原，少年时代随家迁至襄阳，实际在襄阳长大成人，所以米芾自视为襄阳人，号襄阳漫士，又号鹿门居士。襄阳有鹿门山，为唐代孟浩然归隐处。《宋史》的米芾本传称米芾为吴人，不准确。米芾曾在江苏镇江居住过很长时间，但不是江苏人。米芾家庭出身不高，但他的母亲曾长期侍奉宋英宗宣仁皇后。在宋代帝王的皇后中，此人是很具有政治见解的一个，主张为政要体恤民情、招纳贤才，《宋史》称其为“女中尧舜”。由于米芾是一个博学有才的人物，加上他的母亲与英宗宣仁皇后的密切关系，使他得以走上仕途，最后官至礼部员外郎，人称“米南宫”。但实际上，米芾不是一个做官的材料。他深受东晋名士的影响，重个性，曾名其收藏书画的地方为“宝晋斋”。《宋史》本传也说他“不能与世俯仰，故从仕数困”。米芾的真正本领是在书画的鉴定与创作上。宋徽宗任命他为“书画学博士”，可以入宫观官中所藏书画，并与徽宗讨论。徽宗虽然是宋代一个政治上十分无能的皇帝，但他极为爱好书画，本人就是一个书画大家，并在唐代张彦远所写《历代名画记》之后，主持编写了另一部重要的中国画史——《宣和画谱》，又编写了《宣和书谱》，这些都是不能否定的。他任米芾为“书画学博士”，说明他也很有眼光。

米芾在艺术上的成就，首先表现在书法上。他的书法远追东晋的王羲之、王献之，近学唐代的颜真卿，但又不只用中锋，而是中锋与侧锋并用，大胆挥洒，不拘一格，极富个性与创造力。《佩文斋书画谱》卷三十四录《耆旧续闻》说米书“沉着痛快，如乘骏马，进退裕如，不须鞭策，无不当人意”，这是很恰当生动的形容。米芾的同时代人和朋友黄庭坚也盛赞米书笔力“如快剑斩阵，强弩射千里，所当穿彻”。明代董其昌题米芾《蜀素帖》说：“此卷如狮子捉象，以全力赴之。”

米芾行书分为小字与大字两种，其中尤以大字行书，如《虹县诗》、《多景楼诗》、《研山铭》笔力最为雄强，观之令人神往。在绘画方面，米芾创造



(米芾《蜀素帖》局部)

了米氏云山的画法，如邓椿《画继》所说，米芾“以山水古今相师，少有出尘格，因信笔为之，多以烟云掩映，树木不取工细”。米芾的儿子米友仁也善画云山，称之为“墨戏”。实际上，这种画法仍是从观察江南一带在烟云掩映下的山水而来的。如前述王维《汉江临眺》一诗中讲到的“山色有无中”，就最宜于用米氏云山的画法加以表现。

米芾的书法绘画都有高度的创造性，但米芾又以善于临摹古人书画，达到乱真的程度而闻名于世。古人甚至说，米芾用这种办法骗取了别人收藏的真迹。因为米芾借了别人收藏的真迹临摹后，归还给别人时，让人自取一本，而人们往往取走了临本，这样米芾便得了真本。我以为米芾是一个性情率真的人，当不致去干这种骗人的勾当。上述说法当是后人因为推崇米芾精于临摹而造出来的，但这又刚好可以说明米芾的艺术独创性是建立在认真继承古人成就的基础上的。未了还要说明一下，米公祠是襄阳的一大人文景观。我感到它的特点在于不仅是一个宗祠，同时还是一个园林。这园林又不同于我曾仔细游过的苏州园林，而具有襄阳自身的人文地理特色，值得进一步加以研究。

2013年7月13日，夜4时20分写毕于珞珈山

(作者单位：武汉大学哲学学院)

东汉时期的两都之争： 以班固《两都赋》为例

刘成纪

（原载《中华书局》杂志）

中国传统社会奠基于农耕文明，但城市依然构成了这种文明最具华彩的部分。据考古资料，中国的城市最早出现于龙山文化时期，如山东章丘城子崖城址、日照尧王城遗址、河南淮阳平粮台城址、登封王城岗城址、郾城郝家台城址、辉县孟庄城址等，都显现出后世中国城市的基本建制形式。许慎在《说文解字》中讲：“城，以盛民也。”“市，买卖所之也。”这是将人口的自然聚集和商业交换视为城市的基本功能，但事实并不仅如此：首先，城市是人的栖息之地，是各种生活和文化用品的制造中心，但这种人居空间本身就来自人的生产和制造。这意味着，其建筑规划、结构布局必然反映人的欲求和审美观念，具有“作品”的性质。其次，人构建城市，除了追求宜居、审美等目的，也以建筑的形式表现人的意愿、彰显社会理想、映显各种权力关系，从而使城市成为哲学、伦理、宗教观念的物态形式，具有强烈的象征意味。易言之，城市，既是人类的物质产品，也是人类的精神作品，兼具实用、审美、象征等诸种功能。在中国数千年的历史上，它绝不仅仅是为了“盛人”和“买卖”而存在，而是历史、文化、政治、哲学、宗教观念的感性显现。

在有汉一代，经济的繁荣造就了长安以及另外五座著名的都城，即洛阳、邯郸、临淄、宛和成都。在长安与五都的关系中，洛阳的地位最为重要。自汉高祖刘邦始，建都洛阳还是长安就存在争论，并一直持续到西汉末年。东汉时期，洛阳成为帝都，但自光武帝刘秀始，是否应该还都长安则成为新的舆论话题。当时的都市赋，如杜笃的《论都赋》、傅毅和崔骜的《反都赋》、班固的《两都赋》、张衡的《二京赋》等，无一不涉及这一争论。在中国历史上，长安与洛阳是中原王朝的两大政治中心，也是国家地理格局沿黄河流域东西摆荡的两大支点。其中，长安地处关中，坐拥山河之险，具有作为帝都的天然优

势，但同时，这里是“暴秦”的发迹地，其城市形象是欲望性的。相反，洛阳不具备山川之险，但自西周始，它就被视为天下的地理中心，同时也是周王朝的政治首都和周公治礼作乐的地方，这种区位和历史优势，使其成为儒者心目中的理想王城。这样，汉代的两都之争，实际也就成了自然与人文、欲望与伦理等两相对立的价值观念的较量。下面以班固的《两都赋》为例，看东汉士人如何比较长安、洛阳的城市特性，并最终确认洛阳作为帝都的合理性。

一、基于城市历史的两都比较

东汉时期为洛阳辩护的都市赋，集中出现于汉明帝时期。这大概和当时帝都洛阳已成定局、需要文学作品“润色鸿业”并最终打消“关中耆老”的迁都幻想有关。在这些作品中，崔骃的《反都赋》只在唐人编订的《艺文类聚》中留下了断章，傅毅的《反都赋》只剩残句（“因龙门而畅化，开伊阙而达聪。”），《洛都赋》则只赞颂洛阳而不涉及两都比较的内容。这样，班固的《两都赋》也就成了这一时期为洛阳辩护的最具代表性的作品。关于这篇赋的写作缘起和主旨，《后汉书·班固传》云：“（班固）自为郎后，遂见亲近。时京师修起宫室，浚缮城隍，而关中耆老犹望朝廷西顾。固感前世相如、寿王、东方之徒，造构文辞，终以讽劝，乃上《两都赋》，盛称洛邑制度之美，以折西宾淫侈之论。”^①从内容看，这篇赋对洛阳、长安都市属性的定位，与东汉同期赋作没有太大区别，但在论辩策略及论证的严谨和系统性方面，却比前人有了新的进展。

自西汉初年两都之争出现，长安的优势被定位于自然地理，洛阳的优势被定位于历史传统。两都之争其实也就成了自然性的现实与人文性的历史之间的较量。这中间，洛阳虽然在山川之险方面输于长安，但它背山面河的地理优势也常常被提及。也就是说，对其作为帝都优势的论述基本上是历史与地理因素合一的。与此比较，长安城在山川地理方面无可匹敌，但它的历史则长期成了一个讳莫如深的问题。比如在西汉时期，主张建都长安者极少提及这座城市的历史，因为一提及只会使人联想到“暴秦”，从而减损论证的说服力。主张建

^① 《两都赋·序》亦云：“臣（班固）窃见海内清平，朝廷无事，京师修宫室，浚城隍，起苑囿，以备制度。西土耆老，咸怀怨思，冀上之眷顾，而盛称长安旧制，有陋雒邑之议。故臣作《两都赋》，以极众人之所眩曜，折以今之法度。”（见《昭明文选》卷一《京都上》）

都洛阳者也不会轻易碰触这段历史，因为长安毕竟已是西汉的都城，如果将它作为秦帝国历史的延续，也就等于说汉王朝继承了秦朝的暴政。这将从根本上颠覆汉政权的合法性，使当事人冒巨大的政治风险。

但值得注意的是，班固的《西都赋》，开篇抓住的却正是长安城的这个历史“软肋”。如他借“东都主人”之口对“西宾客”的回答：“痛乎风俗之移人也。子实秦人，矜夸馆室，保界山河，信识昭、襄而知始皇矣，乌睹大汉之云为乎？”这段话包含的一个重要的暗示是，西宾客所夸耀的长安宫室和周围山河，是秦昭王、秦襄王直至秦始皇所建构的秦王朝历史的一部分，它天然地和秦朝的暴政相联系。这里的山河之险不仅孕育暴政，而且保护暴政，所谓的地理优势也就因其助纣为虐的本质而展现出负价值。同时，按照这种逻辑，长安因与秦朝的历史关联而成为暴政的象征，主张迁都长安当然也就成图谋使国家回归暴政。东都主人说西宾客“子实秦人”，显然是试图在长安与秦朝之间建立一种关联，从而使长安因其历史原罪而被彻底否定。

中华民族具有“以史证道”的悠久传统，但对历史的态度则往往是选择性的。人们乐于借助正面的历史为当下行为提供根据，但负面的历史则可能成为禁忌，让人故意疏忽或遗忘。在《两都赋》中，班固之所以敢于揭开长安历史这一两都之争中的禁忌，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他为西汉都城史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解释路径。在他看来，西汉初年，娄敬建议迁都关内以及萧何经营长安，都是为了因应时势、不得已而为之的权宜之计，即“娄敬度势而献其说，萧公权宜而拓其制。时岂泰而安之哉，计不得以已也”。这种解释意味着，整个西汉王朝，虽然因接续了秦朝的历史遗产而在道德上有瑕疵，但这种瑕疵同时却形成了对一个道德圆满时代的召唤——这个圆满时代，就是东汉。

班固的这种论述，其实也将两汉帝都的发展史分成了三个阶段：一是长安城地处秦朝旧地，具有“血统论”上的邪恶性；二是西汉王朝为了乱世求生不得不将它作为临时首都；三是经过西汉的过渡，东汉才真正迎来了太平盛世。在这一时期，国家从临时首都（长安）迁往永久首都（洛阳）具有必然性。至此，洛阳城的地位，也就在这种对于历史进展的新解中发生了一个根本扭转，即从关中耆老眼中的临时首都转换成了东汉王朝的永久帝都。相反，长安城这个原本正统的汉代都城，则在两汉的都城史上仅仅具有了临时性。